

智利政局與未來大選

王建勛

壹 基督教民主黨的衰落

一九五八年智利總統選舉時，自由與保守兩黨均支持中立派的亞歷山大（Jorge Alessandre），以三萬餘較多數票當選總統。另一社會黨候選人亞蘭德（Salvador Allende）在共黨支持下競選失敗。一九六四年九月，亞蘭德又在共黨支持下競選，惟因左派人士過份囂張，時有反宗教及赤化智利之言論，反使智利輿論轉趨反共。當時基督教民主黨候選人傅瑞（Eduardo Frei Montalva）乃主張在民主自由中進行全面改革。傅瑞所提出「自由革命」的口號，非僅針對時弊，且亦迎合智利人民愛好自由之傳統心理。右派唯恐智利亦化，亞歷山大遂聯合自由與保守兩黨支持傅瑞當選總統。

傅瑞就任總統後，即開始推行他所謂「自由革命」的實驗，惟因傅瑞無法應付國內左、右兩派的衝突，在五年當政中遭到很大阻礙。左派份子認為傅瑞總統的「自由革命」太過溫和，不會有何進步，主張採取更激烈的方法。右派份子包括與金融、經濟各方面都有重要關連的大地主們，不願意智利的社會與經濟結構有什麼具體改變，反對傅瑞的各項政策。基督教民主黨內部的激進份子，對傅瑞不排除外國資本，澈底實施「銅礦國有化」表示不滿。在此種情勢下，自由與保守兩黨即合併成爲代表右派勢力的民族黨，不再與傅瑞總統合作，左派——特別是社會黨，以及具有惡意的激進黨，亦激烈反對，以致傅瑞總統的「自由革命」在國會中不斷遭到攻擊，影響有關各項改革的法案均無法順利通過，迄今其成就，與其一九六四年當選時所提出的諾言，相距甚遠。

一九六九年三月，智利國會議員選舉，基督教民主黨遭到很大挫折。選舉結果，傅瑞總統所領導的基督教民主黨在參議院五十議席中增加十席爲廿

三席，在一百五十席的衆議院中減少廿席爲五十五席。此次選舉，對傅瑞總統來說，在參議院方面雖小有勝利；但在衆議院方面却結束了他執政五年來的絕對多數席次。相反的，右派民族黨在衆議院中，由九席增加到卅四席。

以智利各政黨在此次選舉所獲選票百分比來看，基督教民主黨僅獲選票30%，以一九六五年三月國會選舉所獲42%選票比較，已有很大衰退。民族黨從一九六五年的13%增到22%，左派社會黨從未到達10%，而今亦佔12%，共黨從12%進到14%，激進黨仍維持以前15%的水準。所以此次選舉，特別顯示出，由民族黨的增進，而使基督教民主黨遭到很大損失，特別是基督教民主黨在參衆兩院均沒有絕對多數了。

一九六九年四月，智利新國會成立，首先傅瑞總統的憲法改革草案即遭否決。接着長久潛在的「銅礦國有化」問題，亦在國會中引起激烈的辯論。至一九六九年八月，國會中左、右兩派議員，均贊成國會礦產委員會所提出的「銅礦立刻國有化」的議案，而又否決了傅瑞總統前所提出的「銅礦逐漸國有化」的法案。因爲「銅礦逐漸國有化」法案不被國會通過，傅瑞總統與美國銅礦公司所簽訂的契約，即告廢除。所以新國會成立以後，不但使傅瑞總統所領導的基督教民主黨遭到很大挫折，並且面臨一九七〇年九月總統大選，「銅礦國有化」的爭論，亦將會影響基督教民主黨未來的命運。

貳 「銅礦國有化」爭論的困擾

智利礦產蘊藏量極豐，尤以銅爲最，其蘊藏量爲世界第一。它的產量，在一九五九年是五十四萬噸，略遜於美國而居世界第二位。一九六一年是五十四萬一千噸，略少於非洲的羅德西亞而居世界第三位。目前智利銅產量已

達七十萬噸，佔國家總輸出的 $\frac{1}{4}$ ，外匯收入的80%，而更成為國家的經濟命脈。並且一九六四年以後，由於傅瑞總統要致力於增加銅的生產，乃計劃要在一九七二年達到一百廿萬噸的目標。

自一八九四年起，智利銅礦即為美國安那康達(Anaconda Copper Co.)及肯乃考特(Kennecott Copper Co.)兩大公司開採經營。肯乃考特銅礦公司擁有智利最大的第寧特(Ei Teniente)銅礦，佔智利銅產量的30%。安那康達銅礦公司掌握夏拉爾(Ei Salvador)和波特勒里羅(Potroillos)兩個銅礦，年產純銅十一萬噸。安那康達銅礦公司所屬智利銅礦開發公司(Chil Exploration Co.)，近年已在智利安多法加斯大(Antofagasta)省朱基卡瑪達(Chugucamata)開發世界最大的銅礦，預計將來每年可產純銅三十九萬噸。又近年智利政府佔有25%股份與安那康達銅礦公司所屬安特銅礦公司(Andes Copper Mining Co.)合營的夷薩地加(La Esclita)銅礦，將自一九七〇年開始每年產銅十萬噸。智利政府佔有30%股權與安特銅礦公司合營的里約勃蘭克(Rio-Blanco)銅礦，最近雙方又投入了一億五千萬美元的資金。其他如Sagasca、Disputada、Los Condes、Michilla等較小銅礦，亦為了達到增產，而從事現代化的發展。

從這種情況來看，誠然的，智利未來銅產量的增加，確是有很好的遠景。但是從半個世紀以來，智利不斷表現的必須使「銅礦國有化」的爭論，迄今已成爲政治上爭論的中心。然而很顯然的，智利本身無力獨自負擔未來在一九七二年超出銅產一倍的計劃，而外國公司在未來投資方面，如果不能獲得安全保障，其廣大投資的計劃，亦將會停止不前。外國銅礦公司在智利開發銅礦，均向智利繳納出口稅，這項稅收久已成爲智利國家財政重要來源。但是該等公司由於銅產量增加，獲利更增，年達一億美元，因而仍使智利人民感到不滿。自一九二九年開始，智利人民要求銅礦國有化的呼聲越來越高，並經過多次工潮，智利政府始建立了一個國營煉銅廠，「銅礦國有化」沒有任何進展。至一九六一年，智利社會黨議員提出銅礦國有化的具體建議，但仍未被智利政府接納。傅瑞總統就任之初，爲迎合國內左派勢力的主張，即提出銅礦政策五原則，主張擴建煉銅廠，增加銅產量，並使外國廠、礦保證智利的管理權。然而由於國內一些大銅礦業主的反對，以及美國銅礦公司的要求與協商，使傅瑞總統在讓步中擬定新的銅礦協定，採取溫和措施，

使智利政府在所有美國銅礦中加入一半的股份，與美國合作經營。在這個政策下，一九六七年間與美國肯乃考特銅礦公司簽訂契約，使智利在第寧特銅礦方面獲得51%的股權，但智利同意該公司增加投資二億三千萬美元，以擴建礦場及煉油設備，使銅礦產量增加到廿八萬噸。一九六九年七月，智利政府又經過艱難的談判，與安那康達銅礦公司達成協議，使智利在該公司所屬朱基卡瑪達及夏拉爾兩個銅礦中獲得51%的股份，雙方同意至一九八四年始達成全部國有化。

但是就在智利政府與安那康達的契約剛剛簽訂，國內即掀起了反對浪潮；左派認爲智利政府作了更多的讓步，以致使外國公司獲得更廣泛的壟斷，並取得更大的利益。一九六九年三月國會大選以後，右派民族黨爲爭取一九七〇年總統大選，亦一反過去的立場，主張將銅礦收歸國有。基民黨左派，早已不同意傅瑞總統的溫和政策，所以在這項激烈爭論中，更造成基督教民主黨內部嚴重的分裂。

傅瑞總統爲暫時緩和此一緊張氣氛，乃聲言決定在三年以後，由國家收購安那康達銅礦公司全部股權。不過他鄭重表示：他雖決心要把外國投資轉變爲國家企業，但是必須要避免使用暴力和干擾的方法，而能維持與美國友好關係下達成此一目標。然而那些反對派又認爲在目前智利國家財政極其脆弱情況下，收買安那康達銅礦公司所有股權，將是一個很重的負擔，如此將使國家財產冒着極大的危險。在進入此一新的爭論中，智利礦產部就公佈了收買安那康達銅礦公司的股權需要六億美元，但國會中的左派議員却指出需要十億美元。因此，各方更指責傅瑞政府的措施，已違反了國家的真正利益，而產生更多反感。因爲基督教民主黨一九七〇年總統候選人、前駐美大使杜麥克(Rodolfo Tomic)要擔負未來銅礦國有化的責任，已成反對派攻擊的主要目標。所以杜麥克亦聲明，保證他將達成未來「銅礦國有化」的責任，收買美國公司其餘49%的股份，並要在提高銅價方面完成一項立法。

智利不僅銅礦被外資開發，年產五百萬噸的鐵，亦在美國伯利恆(Bethlehem Steel Co.)公司開發與經營之下。美國紐澤西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以及其他外國企業亦直接間接的掌握着智利各種經濟發展。只是傅瑞總統瞭解到爲使國家新工業獲得發展，以本身資金不足，必須要依賴外國資本。尤其是他雖面對着國內反對浪潮，迫使其冒着與華盛

頓關係惡化的危險，但是他仍要以合法的途徑與美國銅礦公司展開談判，而避免使用如同祕魯對付美國國際石油公司的「粗暴」方法。所以智利「銅礦國有化」的爭論，固然亦是智利大選前一種政治鬥爭，但它亦代表着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是否應繼續依循外國資本的路線。

叁 農業改革的緩慢與基督教民主黨的分裂

儘管智利礦業活動 在對外經濟活動中，佔有最重要地位，而智利的農業，則仍為國內經濟的主體，所以智利農業發展的緩慢，亦對其國家經濟有重要影響。智利有七千四百萬頃土地，其中三千萬頃可耕地中，至今只有三百萬頃土地在耕種。而且其可耕地中只有一半從事永久性耕種如穀物、蔬菜等，另一半為葡萄園、果園與人工牧場。加以智利農業生產技術仍屬落後，故每年糧食生產均不足以養育全國人民，必須要從外國輸入糧食。一九六四年，以智利缺糧情形嚴重，曾以一億八千九百萬美元的農產品進口，一九六八年，因連年旱災嚴重，其後每年進口的糧食已超出二億美元。

當前智利仍承襲着往昔殖民時的農業經濟結構，亦是農業不能發展的原因。智利全國有七百個大地主，控制着全國可耕地的55%。全國九百萬人口當中，有二百萬是農民，其中僅有十萬是小自耕農，其餘大多是手無寸土的農業僱工。而農業僱工亦承襲殖民時期的古老制度，臨時工多於真正從事農業的勞動者。因此，農民生活貧苦，難以維持一家數口溫飽，迫使很多農民跑到城市去賺錢，不但增加了都市就業困難，亦使更多土地荒蕪。

智利在亞歷山大總統時期（1958—1964），其所持的經濟基本方針，即為提高農業生產，重建農、工發展的平衡，並改善農業人口的生活。但此項計劃，雖使土地生產略有增加，但却趕不上人口增加的快速。傅瑞就任總統之初，於一九六五年即向國會提出一項土地改革計劃，其內容主要是為使水利灌溉普及全國耕地，建立由國家管理的水利灌溉制度。限制土地面積，超出者由國家徵收。廢棄地的利用，對未耕植的土地，分配給有力耕種的佃農，並且為避免可耕地逃避分配，而將全國劃分為數個農業集合區。這個土地改革的最終目的，就如傅瑞總統所說的，要將所有大地主的土地予以徵收

，而使所有農民都能獲得土地。但是傅瑞總統在六年任期當中，他的「土地改革」工作，一直遭到很大阻力；首先一些與國內經濟各方面都有重要關係的大地主，與政府中極右派份子結合，積極反抗傅瑞總統的土地政策。而左派份子，不認為傅瑞總統溫和的土地改革政策，會有多大效果，主張必須採取「革命」的手段。基督教民主黨一些激進份子，亦認為傅瑞總統的土地改革政策不夠徹底，不能真正改善農民的生活。而其最嚴重的，由於傅瑞總統的土地改革工作不能順利進行，無地耕種的農民更多有怨言，加以他們又經常受着政府控制農產品價格的傷害，對傅瑞政府產生更多的不滿。

事實上，傅瑞總統在一九六七年，曾仿效亞歷山大時期的農業改良計劃，從事一部份的土地改革工作，這部份改革工作是由智利農業生產發展協會所推動，在智利中央谷及奧索諾（Osorno）較為富庶地區，徵收了一些大地主的土地，在該地區中，使一萬個無田耕種的農民獲得土地，並且有八〇%的土地實行了再分配。迄今在該協會推動下，建立了四百七十個農會，傅瑞總統期望以建立農會組織，來達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然而由於此一工作進行頗為緩慢，而那些普遍貧窮與落後地區的農民，已感不耐，故紛紛採取佔地的辦法，與地主發生衝突。就在農民佔地事件層出不窮當中，一九六九年三月，蒙特港（Puerto Montt）爆發了大規模農民暴亂，由於軍隊的鎮壓，而演變成九人死亡的流血事件。隨着這次流血事件，學工潮的騷亂，使社會更為不安。各方的譴責，亦貶低了傅瑞政府的威望。基督教民主黨反對派份子，在此次事件以後，由該黨參議員、反對派領袖奧古斯汀（Rafael Augustin Guncucio）領導，正式宣佈脫黨。那些担負着土地改革重要工作的該黨參議員瓊庫洛（Jacques Chonchol）、眾議員蘇拉（Silva Solar）亦跟着採取同樣行動，使智利的土地改革工作，亦就跟着完全停頓下來。由於土地改革的停止進行，農民與政府間更加深了裂痕。

肆 社會不安、通貨膨脹以及軍人的叛亂

除農民貧苦外，智利南部塔卡瓦諾（Talcahuano）等漁業區的漁民，雖隨着魚產豐盛的海洋，但因捕魚條件的不能改進，生活亦是非常困難。智

利北部的羅達 (Lota) 及戈龍乃 (Cronal) 等礦工地區，由於勞工制度的不良，大多數工人遭受着少數工人的剝削與壓迫。就如設立於康塞普森省 (Concepcion) 省的智利最大的華奇巴多 (Huachipato) 煉鋼廠，其工人仍沿用着古老而不合理的梅都、波路 (Medio pollo) 制度 (註一)。這些都加重了智利的社會問題。一些神父們，每天都在爲此一逐漸惡化的社會問題而呼籲注意和改革。左派的學生 Mitr 參加到工人羣衆以後，社會的混亂更加惡化。而主張武裝鬥爭的智利共黨就在這些貧苦地區擴張它們的勢力。所以在智利北部的亞力加 (Arica)、中部的蒙特港、南部的聖地牙哥及康塞普森等地區的騷亂迭起。

另一方面，在一九六八年由連年的旱災，造成了農業及工業生產的嚴重損失，有百萬頃耕地被害。工業也因水利發電萎縮，生產亦爲之大減。失業數字的增加，單是首都聖地牙哥就有七萬人沒有工作。尤其是因智利政府爲救災而實施赤字預算，更加劇了通貨的膨脹。一九六七年，智利貨幣曾數次貶值。一九六八年通貨膨脹又達三〇%，一九六九年初，迫使智利政府再度貶值一二%。據最近智利政府的統計，智利的生活費用，從一九六五年至今，已增加了一五四%。傅瑞總統爲制止通貨膨脹，曾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呼籲全國人民響應政府的緊縮措施；但是工人與學生的反飢餓罷工、罷課及示威，從未停止。

社會不安情勢的逐漸惡化，已成爲傅瑞政府的最大憂慮。軍方爲維持社會秩序所表現出來的力量，更使智利人民擔心軍方可能將要對國家政治實行干預。事實上，在一九六八年間，智利軍方，在安德斯山脈及貝亞哥 (Bipale) 運河地區，不斷與阿根廷發生邊界衝突，智利軍方鑑於阿根廷已在歐洲國家獲得一些噴射戰鬥機、坦克車、潛水艇，而不斷擴充軍備，亦要求智利政府加強智利國防的潛在力量。智利政府以國家財政困難，曾一再拒絕軍方擴充軍備的要求。並且擁有六萬三千人的智利三軍，由於薪餉太低，尤其在通貨不斷膨脹影響下，亦提出了加薪的要求。但是智利政府爲壓制通貨膨脹，在尚未接受代表二百五十萬工人的工會所提出增加工資的二八%的請求之前，當然對改善軍人待遇亦就窒礙難行了。軍中鬱鬱不樂的氣氛，又繼續承受通貨不斷膨脹的刺激，形成憤怒情緒，以致軍中發生不穩的現象。只是智利政府在一九六八年八月答應增加軍人薪餉，始適時平息了軍中的不滿情

緒。但是智利政府的諾言，長久未能兌現，軍人的失望，終使叛亂無法避免。

一九六九年十月廿二日清晨，原任智利陸軍第一師師長，和在十月間被迫退役的陸軍准將威奧克斯 (Roberto Viaux marambo) 領導駐紮智利首都聖地牙哥中心達克納營區 (Tacna) 的裝甲兵團發動叛亂。根據叛亂者的聲明，他們叛亂的目的是對陳舊的裝備，以及薪餉太低表示不滿，決無推翻政府的企圖。他們要求撤換原任國防部長馬蘭比奧將軍 (Tulio Marambio Marchant) 及陸軍司令卡斯迪羅 (Sergio Castillo Aranguiz)。因爲這兩個人對提高三軍待遇及更換三軍裝備之諾言未能履行。

叛亂發生以後，傅瑞總統即命第二師師長、首都聖地牙哥地區警備司令梅恩 (Alfredo Main) 代表總統與叛軍談判。最後政府接受叛軍要求，叛軍首領威奧克斯始在廿二小時後向政府投降，並且主要叛亂份子四十餘人被捕。廿三日，政府基於叛軍之要求，分別更換國防部長，由原任社會工程部長奧沙 (Kossa Perrot) 接任。陸軍總司令由第五師師長西奈德將軍 (Schneider Chereau) 昇任。叛亂首領及主要份子交付軍法審判，然後宣佈解除戒嚴，情況恢復正常。

智利自一九二四年起，從未發生過軍事變亂，所以此次的軍人叛亂，足以顯示智利的政治與社會已極度不安。但是以拉丁美洲來說，智利誠然是一個民主政治有鞏固基礎的國家；智利於一八九一年就已實行民主政治的時候，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還在軍事與獨裁統治當中。所以在此次軍人叛亂中，智利人民繫於他們長久以來的傳統民主精神，而發動了支持政府的運動；無論是學生、工人、農民，以及各政黨，均一致支持政府譴責軍人叛亂，要求保衛民主政體。然而智利親蘇派的共黨亦表示熱烈支持政府的姿態，顯然是在大選前，爲要表現溫和面貌的一種陰謀。

軍事叛亂雖已過去，但真正的問題尚未解決；傅瑞總統要求國會迅速通過增加稅率，以籌措二千八百萬美元，作爲提高三軍待遇及更換三軍裝備的費用，但又遭到左派的反對。並且調整軍人待遇，必然會使不停的通貨膨脹更加惡化，亦爲其他政黨所顧慮。此次軍事叛亂，顯然是軍人要打破傳統，干預國家政治的開始，今後更可能對政府不斷使用壓力，而此種趨向，在未來的總統大選，如左派得勢，右派的軍人亦可能乘機要表現它們的力量。

伍 一九七〇年大選的展望

一九三〇年，一些基督教激進份子與保守派的民族黨脫離，揭發社會主義，要從事對傳統的保守主義進行改革。這一些人因受當時宗教的壓力，長期都是在秘密中艱苦活動，直到一九五七年始有了基督教民主黨的雛形。該黨主張社會主義，但拒絕馬克思與法西斯主義的影響，而以基督的「愛」代表該黨的精神。一九六四年，該黨因能適應智利人民要求溫和改革的需要，使基督教民主黨得以執政。因為這是在所有拉丁美洲國家當中，基督教民主黨第一次執政，故其勝利，曾震撼整個拉丁美洲。傅瑞在競選時的信心，其所表現的唯有基督教民主黨才能解決拉丁美洲所存在的各種問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

現在傅瑞總統的六年任期，僅有數月即告屆滿。（註二）雖亦有不少的成就，但農業改革的遲緩、制止通貨膨脹的失敗，以及在社會上不斷發生的嚴重騷亂，人民生活難以獲得真正改善，而使智利人民對於傅瑞總統的「自由革命」不能不感到失望。再者，傅瑞總統的政策左、右不定，使其對黨的領導亦逐漸喪失了向心力，雖儘量防止黨內分裂，不斷惡化的政治爭論對派領袖奧古斯汀就聲言組織新左派人民行動黨，亦推出農業改革專家瓊庫洛競選總統。據瓊庫洛表示，新左派人民行動黨，主張與所有左派結合，要徹底排除國家容納資本主義制度。他認為基督教民主黨過去雖已從事一些改革；但迄今並沒有達成一種革命性的改變，農業改革沒有徹底實行，工業化的發展亦仍是依靠資本主義的關係。他指出，蒙特港農民流血暴亂，在軍隊鎮壓下，工人仍不斷罷工；在警察監視中，學生還是繼續示威，以及經常被政府警告的輿論，仍舊對政府表示不滿，都表明人民對現狀需要改革。所以他提出該黨的策略，是要以他的黨代表人民利益，利用輿論的趨向，號召青年來結合擁有羣衆的左派力量，以徹底實行排除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

基督教民主黨，經過國會選舉挫敗，已失去右派支持，而今黨內分裂，更削減了該黨的力量。為挽救危機，就試圖採取與左派結盟的政策。但是民族黨找到很好的藉口，它們一方面推出頗孚衆望的中立派、前總統亞歷山大

智利政局與未來大選

參加競選，另一方面又聲明該黨將以「中間路線」參加大選。據該黨發言人哈爾巴（Onofre Jarpa）表示，民族黨不是左派，亦不是右派，而是代表中產階級的政黨。所以它不但可獲得左派政黨的票源，亦可獲得那些對基督教民主黨感到失望的選民支持。他指出對民族黨更有利的條件，主要是基督教民主黨長久不能制止的通貨膨脹，其經濟不斷惡化的情勢，已使原來支持傅瑞總統的中產階級受到很大傷害，傅瑞雖實行了稅制改革，但更加重了中小商人的負擔。

這種情勢，對基督教民主黨候選人杜麥克來說，雖其本人具有很高的政治聲望，如與民族黨候選人亞歷山大抗衡，就顯得非常困難。而其黨內分裂，新左派人民行動黨參加競選，勢必分散左派票源，使基督教民主黨企圖與左派結盟政策，亦會遭到阻礙，何況目前各左派政黨，就因新左派人民行動黨聲言競選，而在策略上都有了改變。原來準備與社會黨及共黨結合的激進黨，已推出巴洛塔（Alberto Baltha）參加競選，接着獨立黨亦推出塔路拉（Rafael Tarul）、社會黨推出亞蘭德（Salvador Allende）、共黨推出尼羅達（Pablo Neruda），而形成左派五人競選的局面。左派多人競選局面，對左派各政黨來說，由於力量抵銷，而均無獲勝的希望，但基督教民主黨則將因各左派政黨獨立競選，亦無法獲得左派支持的力量。如此民族黨的亞歷山大就可能穩操勝算。但是不可忽略的，距本年九月大選以前的一段時間，左派政黨策略的任何改變，仍可以影響到智利大選的趨向。

註一：所謂（Medio pollo）制度，乃是資格較老的工人，把他的工作交與他人代理，但却付給代理人半個月的工資，而代理人，亦可找第三人代理，再以其半數工資的一半給與他人。如此循環，形成一種工人間的剝削制度。

註二：智利憲法規定，總統任期為六年，以一任為限，但隔一任後得再當選。

歷史寫下了答案

——「共產黨宣言」——二〇〇年

發行人：吳俊才

著者：尹慶輝